

我想谈谈孤独

/ 宗乙

日本哲学家三木清曾这么形容孤独：“孤独不是在山上是而在街上，不在一个人里面而在许多人中间。”哥伦比亚小说《有些事赤脚女人不能做》，主题就是“孤独”，作者玛格丽塔·加西亚·罗瓦约。这是一本充满生活细节的书，恰恰是这些细节展示了女性生活中的脆弱时刻，她们带着希望走在自我救赎之路上，却迟迟看不到终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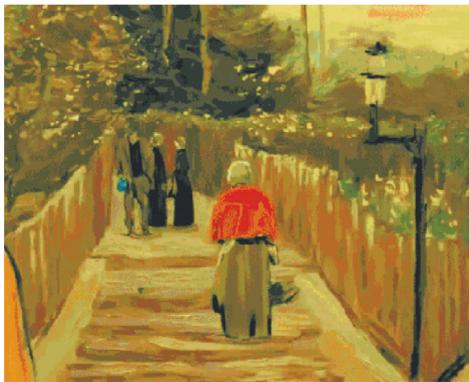
小说中有一些特别的意象，比如电视。电视机的出现到底是一种陪伴还是压迫？电视的出现一方面是为了表现人物，同时也是作者为穿插反映电视在当代社会的“影响力”而进行的设计。作者回忆：“我对电视之所以如此着迷，是因为在我的生活中它本就是无处不在的。从哥伦比亚卡塔赫纳的童年记忆到最初在布市的生活，电视对我的意义是非同寻常的。”

试举米里亚姆的故事分析。据作者自述，米里亚姆是最贴近她真实生活的一个故事。失去丈夫后的米里亚姆怀念和丈夫一起讨论电视节目里任何一个细节的时光，而她和女儿迪亚娜的交流问题则是她孤独的主要缘由。电视成为米里亚姆唯一的生活主题：通过电视，回忆有丈夫陪伴的日子；通过电视，努力寻找可以与女儿交流的话题；通过电视，度过一个人在家的无聊时光；也是通过电视，

“超越”死亡

/ 路来森

对死亡充满恐惧，似乎，是人之本性。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人，对死亡的感受或者认识，恐怕还是不一样的。也许，因为某一个契机，因为某一次际遇，乃至于悲惨的遭遇，就改变了你对死亡的看法，甚至于，使你的生命得到升华，干脆就“超越死亡”了。



法国哲学家蒙田，就是这样一位“超越死亡”的人。

三十岁左右时的蒙田，极其害怕死亡，因为恐惧死亡，就常常使自己陷入忧郁中，陷入胡思乱想中。他想象着“他临终前，人们围绕在他床边哭泣，或者是‘熟悉的手’按着他的额头向他告别的场景。他想象自己躺在墓穴里，眼前的一小圈天光就是人生的最后一幕：他的财产被清算，他的衣物将分赠给朋友与仆人。”这样的胡思乱想，整天缠绕着他，使他成了死亡的“阶下囚”。

究其原因，大概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因为蒙田对哲学著作的大量阅读。我们知道，死亡，是哲学研究的一个“永恒主题”，蒙田大量阅读哲学著作，本是想借此解除自己对于死亡的恐惧心理；岂不知，哲学著作对死亡的过度解读，不仅没有解除蒙田对死亡的恐惧，反而增大了他对死亡的恐怖压力。其二，是蒙田三十岁左右时，他最好的朋友艾蒂安·德拉博埃蒂死于瘟疫，他的父亲、弟弟去世，他6个孩子中的四个相继去世，而有些人的离世，则纯粹是因为偶然性因素

独领风骚“玉散文”

/ 刘敬

鲁迅文学奖得主鲍尔吉·原野，与歌手腾格尔、画家朝戈被称为当今中国文艺界“草原三剑客”。鲍尔吉的文字如秋凉之夜满天星，颗颗闪耀着宝石般光芒。

打开《梨花与我共白头》的刹那间，便觉长风拂过，徐徐地，从苍茫草原一路吹来。全书三辑，文字朴素率性，睿智幽默。寻常巷陌，母亲孩子，花草云鸟，阳光风雪……身在十丈红尘，心却纤尘不惹，丝绸一样柔软。

鲍尔吉说，文学像河流一样，你的作品永远是下游，上游是读者，作品的好坏是由时间和读者决定的……要为广大，为那些满怀信心、艰苦劳动面向未来的人，为内心的需要而写作。诚哉斯言！

这个蒙古族男人热爱故乡草原的一切，漫游的风、行走的河流、一双海拉尔棉鞋……面对鲍尔吉的文字，常常忍不住猜想，也许，他正是想通过笔底流淌的至真至美、至纯至善的文字，来唤醒人们对周遭一草一木的尊重与敬畏吧？但，

缓解每一次等待女儿电话的焦急。

故事中还出现多扇窗。玛格丽塔把米里亚姆的住所设计在一楼，加上经常开着的临街的窗，为这故事创设了一种特别的孤独基调。因为真正的孤独，并不一定全是一个人的独处描写，当窗外的人流和窗内一个人的伫立形成对比时，也是一种让我们可以去想象剩余“八分之七”的隐藏的孤独。

玛格丽塔不偏爱充满幸福感的“童话”故事。她认为，文学就应该完全贴近生活中的所见所感，所以她的作品中绝对不会出现魔幻现实主义元素。她笔下的人性就像暴露于沼泽地一样的混沌中，但总会有办法解救自己。

胡莉娅、贝亚特里茨、玛丽和莉莉是四个处在爱情里的孤独女人的代表，作者设计了精巧的结构把她们联系起来。阿图罗是一个背负着重重的道德伦理和家庭责任的已婚男人，是胡莉娅的情人、贝亚特里茨的丈夫，也是那个让莉莉通过玻璃窗看见令完美身材的邻居陷入无限等待的秃子。胡莉娅和阿图罗因为电影院前的一见钟情开始秘密恋情，胡莉娅日思夜想的是他能为她填满冰箱，而她每次打开的冰箱，都是空空如也。

卡洛斯同时出现在两个女人生命里——贝亚特里茨和玛丽。酒吧是贝亚特里茨唯一可以舔着伤口疗伤的角落，在这里她可以不用理会丈夫阿图罗的电话，可以不用管孩子的事，可以调

整偶遇前任情人卡洛斯的心境。玛丽和丈夫卡洛斯的争吵来源于对儿子沉迷动画片的担忧，她更想宣泄的是藏在内心的“冰川”、一个抛弃家庭的男人给她留下的孤独。至于莉莉，她享受和老板在一起的所有时光，而每次店里关门后，她只有自己的影子作伴回家。

这是一部围绕女人而写的作品，玛格丽塔作品下形形色色的女人们，都只有一个名称——女人。对于年轻女人、老女人、外国女人、已婚女人、未婚女人……玛格丽塔觉得女人不应该被当作物品一样被贴上标签。女人本身就应是一个独立群体，不应依附于其他人或其他社会群体关系的思想，因为她们的失望、孤独、悲伤大多来源于这些关系，她们应该做的是打破那扇很多女人透过它看外面世界的窗户。

为什么会选择书中贝亚特里茨的一句口头禅作书名？一方面出于西班牙语音调和韵律感之由，另一方面，口头禅本身可以作为一个框架，里面的填充物是什么？哪些事情会是女人不能做的？一个赤脚女人为什么不能做这些事？而她，为什么又是一个赤着脚的女人？一个空间足够大的框架，足够容纳读者的万千思绪。

玛格丽塔说：“因为我谈谈孤独，所以我知道我笔下的人物最好是女性，她们在这个主题中起着功能性的作用。我不喜欢给我笔下的人物贴置任何的标签，我可以这样说，这是一次由女人们自己创作的文学，同时也是读者们的文学。”

学飞，行云

/ 桑子

8岁女儿的涂鸦、妈妈记录的童年盟盟“最纯真的部分”，台湾作家朱天心与女儿谢海盟合著《学飞的盟盟》，是一册记录放养式教育的亲子书。

朱家的放养式教育，要从勇敢、率性的外婆刘慕沙说起。

60余年前，台湾苗栗一个客家女孩不顾父母反对，离家出走，要与大陆来的作家朱西宁“携手同奔文学前途”。后来，客家女孩改名刘慕沙，与朱西宁有了三个女儿。只要求女儿不说谎话脏话，夫妇俩便任其浸淫书堆里自然成长。放养式教育的结果，是天文天心天衣三姐妹也与父母“携手同奔文学前途”，朱家群体写作不仅仅成为台湾文学传奇，近些年更随其笔下的影视形象走向全世界。

从1983年编创《小毕的故事》开始，朱天文和台湾名导侯孝贤合作三十余载，《风柜来的入》《童年往事》《恋恋风尘》《悲情城市》……侯孝贤执导的台湾新电影代表作都有朱天文参与编剧，作家阿城形容这种合作，是一种贵金属加稀有金属的独特合金。

侯孝贤是朱家常客，4岁盟盟与母亲相处的一个小插曲竟让他顿悟：“取片段，把我感觉过瘾的片段剪在一起，时间流逝，生死哀荣，一切不言而喻。”1994年《学飞的盟盟》初版，侯孝贤写序感谢朱天心记录下来的盟盟，让他见识到有人是这样在理解世界，同样也保持着这份理解在生活，“许多了无目的的存在的方式，许多不明所以的生长姿态，都很珍贵。”

是的，到朱天心这里，女儿谢海盟以更超脱的状态被“放养”着，“起先的心情很单纯，我只觉得自己甚为有幸得以亲自目睹一个人，像一粒种子似的孕育发芽成长的过程。”目睹眼前这个小女孩甩掉外婆的大铲子帮着拌狗粮，趁着外公到持园艺泥土时坐一旁边“麻糬”，叫“主人”（大姨）为“小羊”（盟盟）脖子系根绳儿，揪住大黄猫脖子拎进拎出舍不得放人家走……浑然如自然之子，妈妈却在三省吾身：“战战兢兢地做着人家的父母，并不确定是不是每一样的对待和处置都是‘对’的，或者说，是健康的、有益人格发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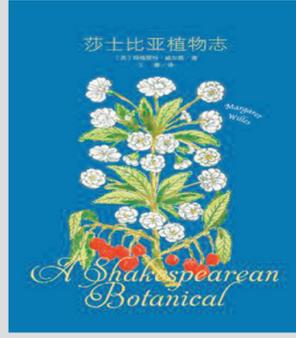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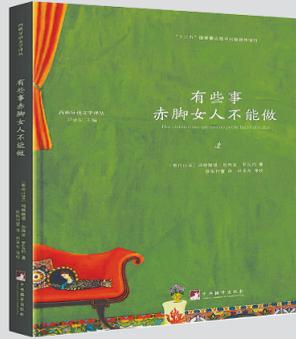
时光流逝，“学飞”盟盟今安在？2015年，侯孝贤以新作《刺客聂隐娘》夺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编剧群新人谢海盟首次亮相，并带来新作《行云记》。向媒体聊起与大导演的合作，谢海盟不卑不亢：侯导从小就爱看笔记小说，聂隐娘这个故事非常吸引他。我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搜集唐朝资料、选修唐朝史。加上我大学修民族学，很难不碰到唐朝。我写了小说《隐娘的解读》。碰巧侯导觉得有用，那就一起来完成《刺客聂隐娘》。

尽管拥有无限自由的时空，谢海盟依旧排斥活在家族光环下，曾有一段叛逆期，不看书不写作，一切认知零碎。直到大学快毕业，不愿加入“啃老族”，才开始跟着大姨写剧本，参与电影拍摄。

在自己编剧本外，谢海盟对聂隐娘的解读别有趣，不是躲躲藏藏才叫“隐”，光天化日之下大刺刺地杀人，也是“隐”的一种。”甚至由这个角色，“85后”谢海盟悟到与人世如何相处：保持距离，像看一个故事的发生。

《行云记》是《刺客聂隐娘》的拍摄侧记，记录侯孝贤的创作理念，也记录她自己的思考。“提起的那一时刻，就是自己和纸笔的关系，父母无法帮忙完成。”终于，谢海盟也为家族自豪了。“我妈妈曾经形容我们像一群狼，活在同一屋檐下是一家人，又各行其是。蛮好的一个机缘，此生能够有这样的缘分聚在一起这样生活。”

本版电邮
zhbbookworm_123@163.com



莎翁的植物世界

/ 陆小鹿

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植物盘点，书名叫《莎士比亚植物志》，小开本，200多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搭配了彩色花卉插图，读来不费脑力。玛格丽塔·威尔斯是作者。她在伦敦东部有一座花园。通常，我们喜欢什么就会留意什么，所以，她读莎翁会特别留意到植物也就好理解了。玛格丽塔认为莎士比亚对植物学非常熟悉，比如《冬天的故事》第四幕第三场讲的都是花卉；《哈姆雷特》也大量介绍花与香草；《理查二世》中特别提到水果杏；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里，莎翁还开起了胡萝卜和卷心菜的双关玩笑……

莎士比亚何以拥有如此渊博的植物知识？玛格丽塔认为首先和他的出身有关。莎士比亚出生在英格兰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小镇，常漫步在沃里克郡乡间，懂得各种野花，他将三色堇称作“爱懒花”，将毛茛称作“杜鹃芽”。其次，植物学家们确信莎翁大量的植物知识来源于书籍，最起码参考了杰拉德的《植物志》。

莎翁在作品中提到的植物，有些是大家很熟悉的，比如苹果、杏、卷心菜，但莎翁赋予其特别的象征意义。拿苹果来说，莎士比亚就写过约翰苹果、粗皮苹果、野苹果、“羽毛外套”（一种金褐色苹果），还有考斯塔德（一种大苹果）。有些植物，则是我们平时很少见到的，比如乌头，《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罗密欧自杀使用的就是这种毒性植物；糙斗菜的法语谐音为忧愁，莎翁用它象征《哈姆雷特》中奥菲莉娅的哀恸；《冬天的故事》提到冠花贝母，这是一种原产中东的花，1580年前后引入欧洲；《罗密欧与朱丽叶》里提到槿棒，16世纪西方婚礼有一习俗，就是新郎新娘同寝前要先吃一个槿棒，因为槿棒有助受孕。

此外，从《莎士比亚植物志》还可学到一些植物别名：鸢尾花又叫洋兰，芸香也称“恩典香草”，红门兰竟然还叫“死人指头”，雏菊被唤作“清晨之眼”。这些植物的习性及应用，书里也都一一作了介绍。

玛格丽塔提醒读者，读书要关注细节。莎翁的世界，细节着实有趣有味得很。

日本学者写科举

/ 赵青新

京都学派历史学者宫崎市定（1901—1995年）长期致力东洋史研究和对中国史普及。他在1946年写了一部《科举》，因战时写得较仓促。1963年，宫崎市定重新创作《科举》，他说，要尽可能客观地介绍给社会，“希望努力描绘出科举制度及其实态”。

《科举》是作者学术生涯的一部小册子而已，但视野博通，文笔晓畅，逻辑明快，作为面向日本读者的通识读物，作品字数不多，14.2万字。

中国科举制度肇始于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年），形成于唐，经宋、元、明，延续到清末，存在了1300余年，以之为历代取士之正途。宫崎市定选取形式上最为完备的清朝末年作为大致基准来展开论述，这是科举制度经历鼎盛之后走下坡路趋向没落的时期，暴露的问题非常之多。比如，各种匪夷所思的科场舞弊行径，生员的道德品行，考官的无能昏庸，等等，都有生动的描述。宫崎市定指出，即使得将科举制度当作问题来对待，也必须深入地具体地分析，要从这种制度长期延续的中国社会以及文化基础出发。

科举的本质是人才选拔制度。科举以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特色，使得孔子所倡导的“学而优则仕”的高贤理想变成现实，在1300余年间培养了大批官吏，其中不乏杰出的文人，在推动偏远地区或田舍郎的文化进步方面更是功不可没。然而，科举制下的读书习气，是因为读书做官才形成的，固然使士人勤学，也使士人鄙俗。“赚得英雄尽白头”的策略，让皇帝愈益直接地控制士人，巩固了皇权。严苛的考试扼杀了独特的人格，真能过天堑登高台的少之又少，更多的是虚掷了时光，活成范进这类迂腐的庸材。借由科举形成的门荫与结党营私、集团斗争，也使得科举沦为官僚政治的附庸，仍然是等级化的、特权化的。宫崎市定尤其强调抑武崇文对中国国力的削弱，以至于后来无法抵挡外来侵略。

中国比欧洲更早抛弃了贵族制，科举制传播海外，为朝鲜、日本等国挪用，亦引西人欧美学习。宫崎市定也提及康熙帝发布的《圣谕广训》在德川时代传到日本，被原封不动地传诵，明治时代颁布的《教育救国》就受到了《圣谕广训》的启发。日本的教育与文化，吸收中国的经验非常多。宫崎市定写这本书的目的，讲的是中国历史，其实也在提醒同样身为“考试炼狱”的日本，在教育上应当避免的犯错误、应当注意的问题。

珠海书城 本周新书畅销书榜

- 1.《美国陷阱》 [法]弗雷德里克·皮耶鲁奇 [法]马修·阿伦 著
- 2.《小飞机，欧洲行》 毕淑敏 著
- 3.《坏血：一个硅谷巨头的秘密与谎言》 [美]约翰·卡雷鲁 著
- 4.《金庸往事》 沈西城 著
- 5.《读孩子们的书》 [日]河合隼雄 著
- 6.《寻找白岩松》 刘楠 著
- 7.《大英博物馆中国简史》 [英]霍吉淑 著
- 8.《生命最后的读书会》 [美]威尔·施瓦贝 著
- 9.《高情商职场沟通术》 林开平 著
- 10.《孤独的吃吃吃》 王蒙、郭兮恒 著

珠海书城 3260066
湾仔沙书城 2255225
新华书店天虹店 8866883
KINHUA BOOKSTORE 新华书店书馆 3230081